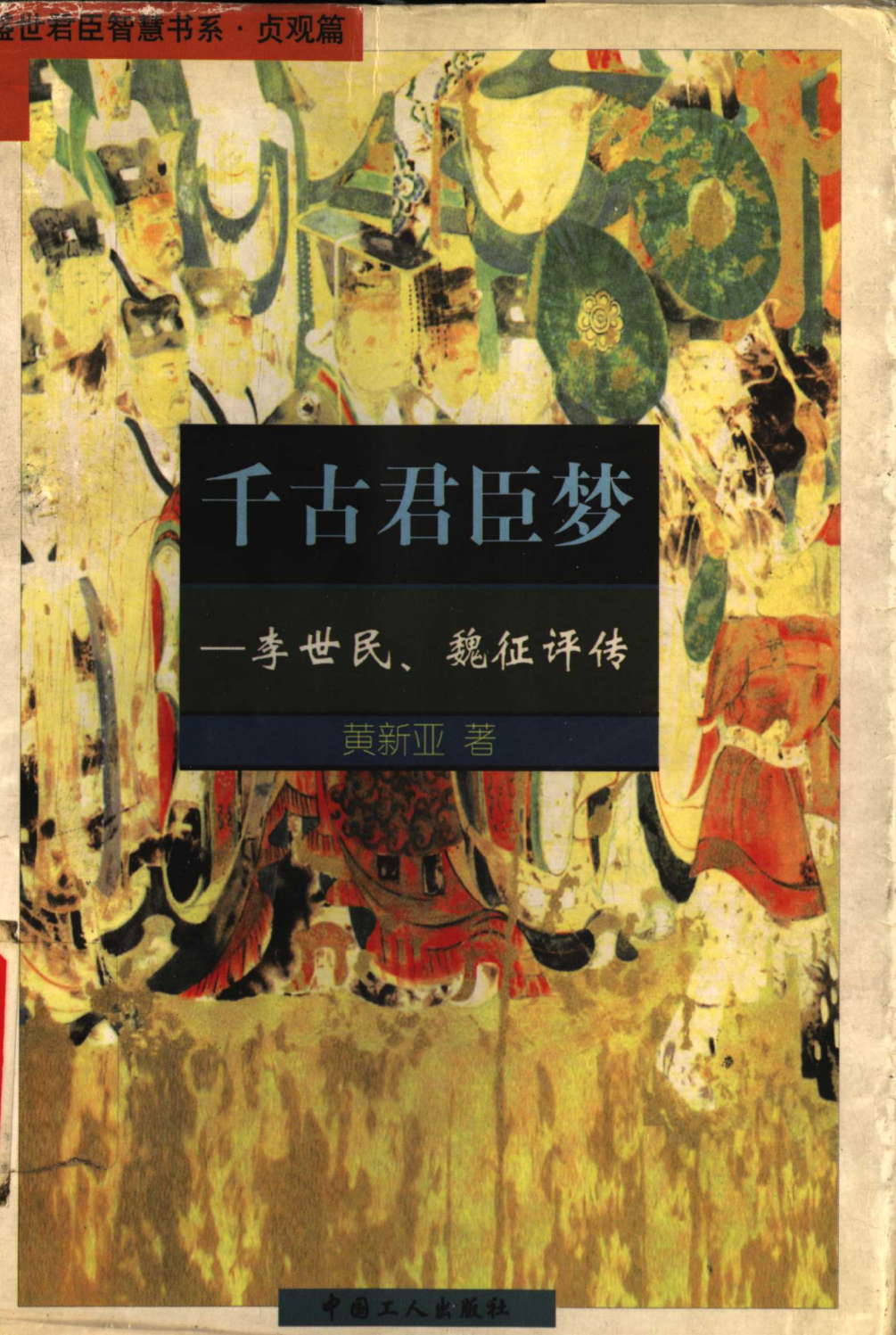


盛世君臣智慧书系·贞观篇



千古君臣梦

—李世民、魏征评传

黄新亚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千古君臣梦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君臣梦:李世民、魏征评传/黄新亚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盛世君臣智慧书系:贞观篇)
ISBN 7-5008-1937-4

I. 千… II. 黄… III. ①李世民-评传②魏征-评传
IV. K8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557 号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外大街)

北京兴泉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9 月第一版,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8
字数 252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8.50 元



图 1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魏 玄 戒 像



图 2
魏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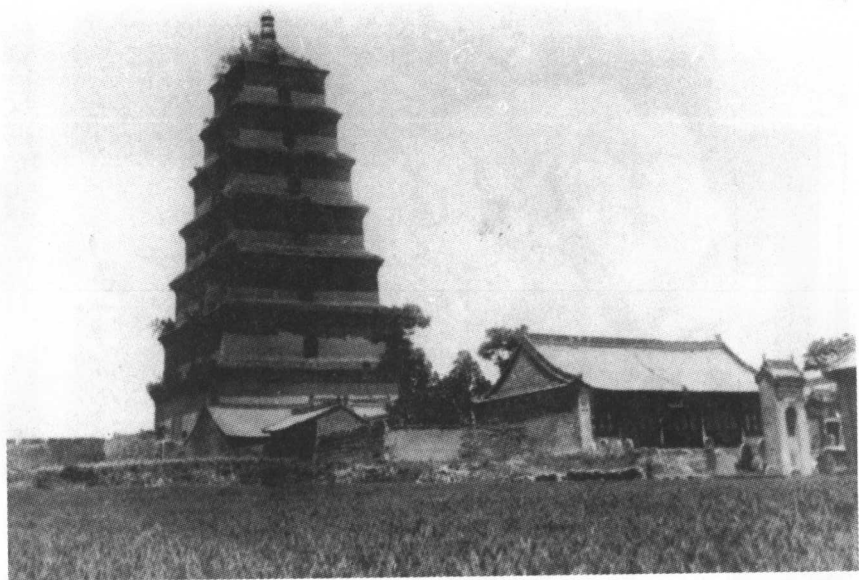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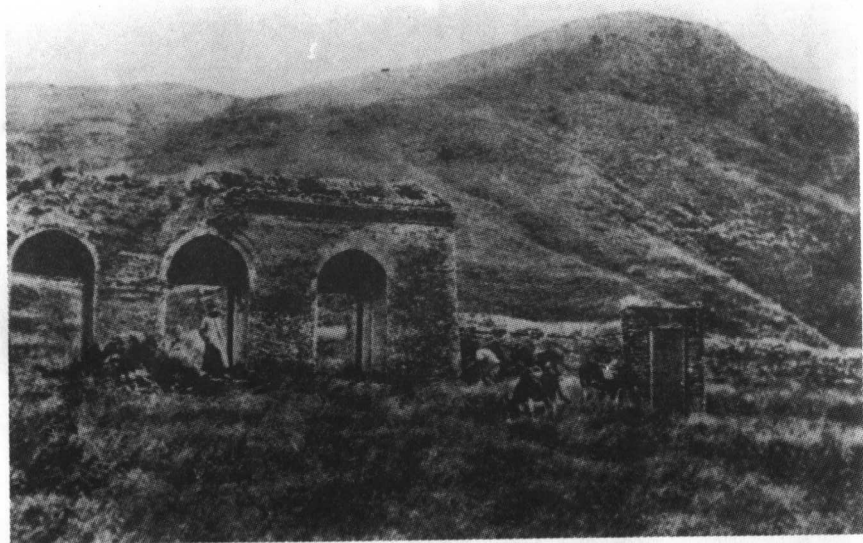


图3 李世民支持玄奘译经之地慈恩寺

图4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玄武门残壁



SBM4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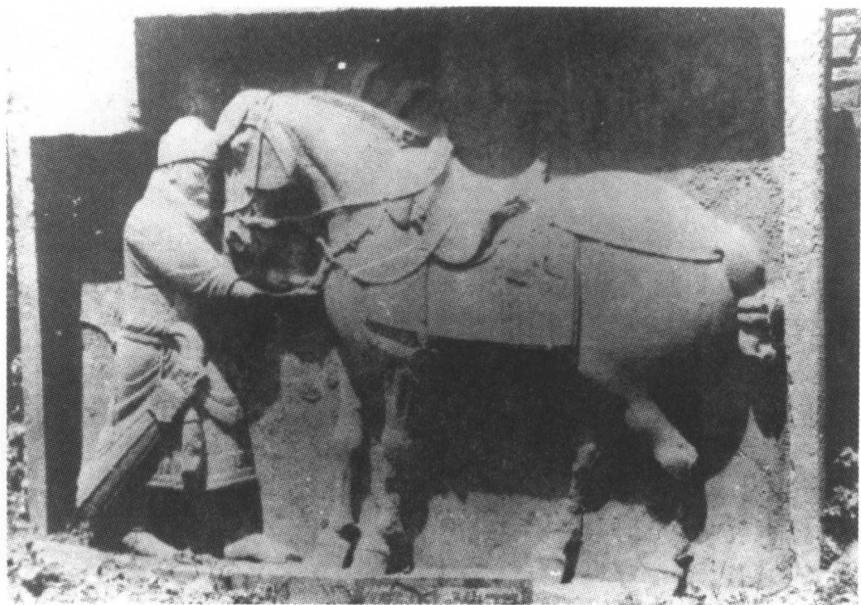


图 5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图 6 昭陵六骏之青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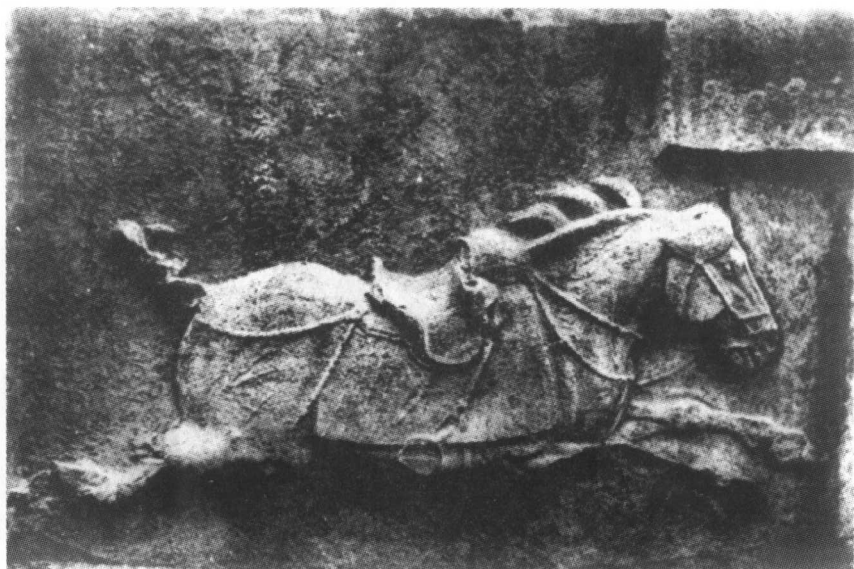




图7 昭陵六骏之白蹄鸟

图8 昭陵六骏之特勒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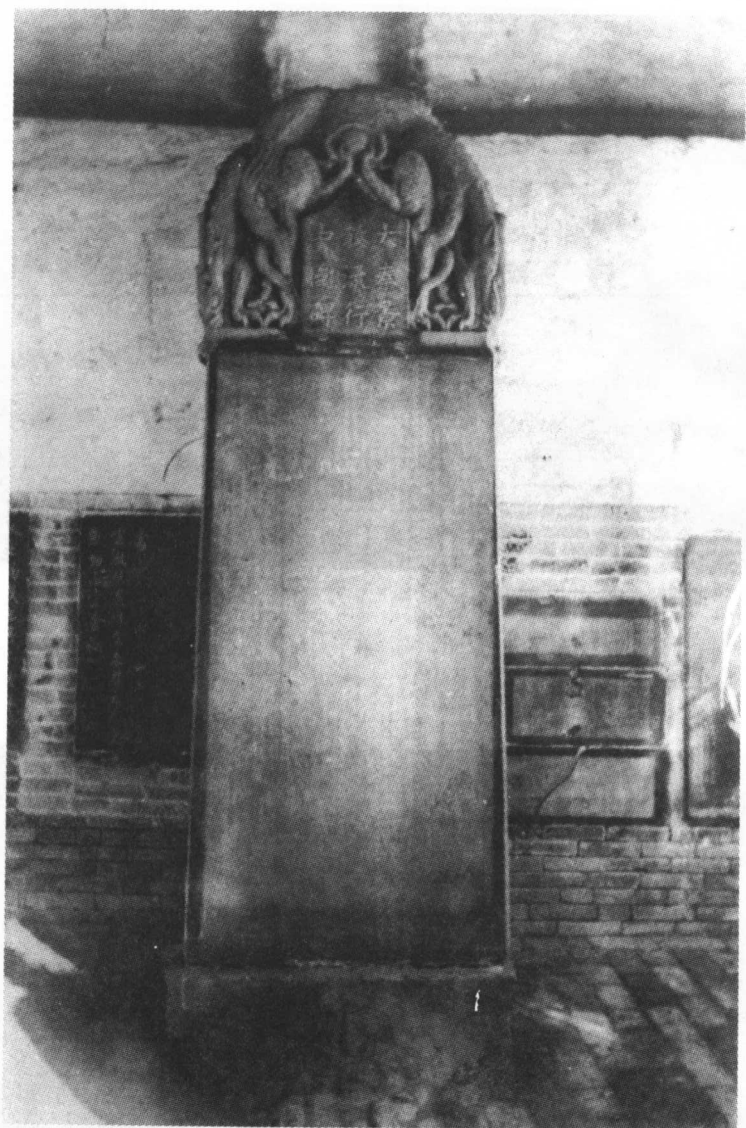


图9 西安碑林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称基督教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唐都长安，李世民准许阿罗本入官传道，并于公元638年准造波斯寺，后改名大秦寺，是为基督教远播唐代中国的标志，李世民也被视为起了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君主之一。



图 10 龙门，李世民公元 620 年从这里渡黄河进攻
占领了河东全境的宋金刚、刘武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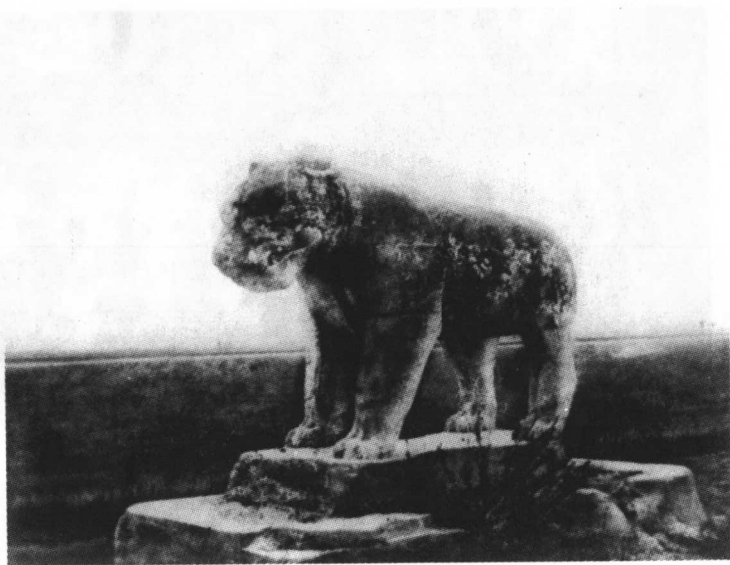


图 11
李世民为父亲
唐高祖李渊献
陵所设石虎



图 12 李世民敕封少林寺御书碑

图 13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冠部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充满理想色彩的文化梦，也是中国智慧宝库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即使历史被颠来倒去，帝王将相或者被尊奉为“圣明天才”，或者被划入“牛鬼蛇神”行列，唐太宗和魏征这一对封建君臣，总是被视为具有文化偶像性质的历史遗产，令后人尊敬。

这是中国人总是受政治人生制约的文化传统所造就的历史现象。古老的家长制宗法社会结构体系以原始血缘群体意识为基础，使得个人总是融合于家族社会的总体之中。由于大家都是同一祖先的儿女，所以彼此之间应该相亲相爱；每一个人都将自觉地为其家族群体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其间并不存在什么个人的痛苦牺牲。于是，每一个人即使在现实的苦难深渊中挣扎，也可以用对他人的责任来超越这无尽的忧患，一切外来的玄想

信仰，都可以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伦理构想，个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兼济天下工作的一部分，形成政治而生活的宿命。

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一切政治思想，都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思想，体现着中国人所独创的人生智慧。讨论中国古代最为成功的“贞观之治”的两位开创者的政治思想，无疑是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

唐太宗在公元626年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从父亲唐高祖李渊手里夺取了政权，作为唐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面对百废待兴的形势，他不能不寻找巩固这个属于自己政权的最佳方案。他作为骑在马上打天下的武夫，最擅长在战场上厮杀；他在和李建成、李元吉集团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较量中获胜，说明他对政治斗争的谋略手段也十分在行。但是，他发现仅靠这两手并不能治天下，于是，他向他周围的臣僚不断求教。

唐太宗周围的臣僚有相当的广泛性，高士廉、长孙无忌、长孙顺德等是参加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的功臣；程咬金、李勣、秦叔宝等是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封德彝、萧瑀、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是隋朝旧官吏；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是进军关中建唐途中搜罗的才士；尉迟敬德、褚亮、李百药等是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俘虏；马周、李义府等是“寒士”，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执失思力、史大奈、李谨行、契苾何力等是“胡人”，魏征、王珪、薛万彻、冯立等是原来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中坚分子。他们面对唐太宗提出的问题，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向唐太宗作出了回答。面对百家争鸣，唐太宗反复比较判断，发现只有那位曾经作为政治对手的魏征，提出了最符合自己需要的见解。

魏征中年时参加反隋起义，随李密归唐，以招降李勣等瓦岗军旧部得到李建成赏识，因而为巩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不断

出谋划策，几次陷李世民于险境。李建成被李世民消灭，魏征立刻成为阶下囚。唐太宗当面质问：“汝离间我兄弟，何也？”想把这场兄弟间自相残杀的责任推到魏征身上。魏征想唐太宗既然可以在战场上把尉迟敬德这样的对手收降，便也可以在政治斗争中从对手那里争取人才，于是回答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唐太宗因此发现魏征人才难得，“改容礼之”，并将魏征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魏征想自己不是随唐太宗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没有老本可吃，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有为推进唐太宗巩固政权、繁荣国家的事业作出贡献。所以当唐太宗一旦提出：“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他立刻回答：“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并且胸有成竹地保证：“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使得唐太宗不能不注意魏征提出的各种批评建议。这出流芳千古的君臣治国戏剧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开场，那些为人所称颂但又需要辨析理解的历史故事同时得以产生。

唐太宗做了皇帝，想去泰山封禅，证明自己已得天命；魏征反对，理由是为君者的当务之急，是“先存百姓”。唐太宗的封禅之行因此罢议。

唐太宗派魏征去“宣慰山东”，魏征在山东把曾经参加过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人，也就是那些曾经反对过唐太宗的国家通缉犯一一释放。唐太宗发现魏征此举是为了让那些与李建成有瓜葛的山东豪杰放弃疑心，归顺朝廷，于是将魏征的官职从詹事主簿提升为谏议大夫。

唐太宗在公元627年听到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冯盎造反的消息，准备派兵去镇压；魏征反对说：“反状未成，未宜动众。”建议改派人去解释中央政策，平息了岭南的骚乱。

唐太宗喜欢打猎，有一次收拾好了行装，正要出发，恰好魏征进宫奏事，唐太宗赶紧取消行动计划。魏征问：“听说陛下要去南山，外面的卫队已经整装待发，陛下怎么又不走了？”唐太宗说：“我本有此心，但是怕你埋怨，所以临时中止计划。”

唐太宗喜欢一只鸟，放在肩膀上玩，觉得很开心。不料魏征来了，唐太宗赶紧把鸟藏在袖子里面。魏征故意奏事不止，唐太宗始终不敢把鸟拿出来，结果这只鸟被闷死在唐太宗的袖子里。

唐太宗执政数年后，自以为做得不错，于是问魏征：“怎样做才算是明君？”魏征回答说：“兼听纳下。”唐太宗于是常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并且对臣下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惧。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然而魏征仍然不肯说恭维话，指出唐太宗“不悦人谏，虽讷勉听受，而终有难色。”

唐太宗打败了东突厥，俘虏了东突厥的颉利可汗，雪洗了当年不得不向突厥妥协的耻辱。再加上“数岁丰稔”，“斗米四、五钱”，于是向太上皇李渊报告说：“百姓获安，四夷咸服，天下大治。”就在“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的时候，魏征要对唐太宗说：“天下大治了，我不以为喜。唯一能让我高兴的是陛下能居安思危。”

唐太宗执政的第十四个年头，大唐帝国已经充满步入辉煌的气氛，魏征又在群臣歌功颂德的同时，上了一篇著名的《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批评唐太宗的过失：一是贞观初无为无欲，现在“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二是贞观初体谅百姓辛苦，无所营为，现在“意在奢纵”，随便动用民力。三是贞观初损己利物，现在追求享乐之心抬头。四是贞观初爱君子，远小人，现在是“昵近小人”。五是贞观初崇尚节俭，现在是“好尚奇异”。六是

贞观初求贤如渴，现在是“由心好恶”，把人才“一朝疑而远之”。七是贞观初杜绝畋游，现在是每逢打猎，就晨出夜归。八是贞观初君臣同心，现在是上下隔阂。九是贞观初“屈己从人”，现在是矜持自傲。十是贞观初虽遇天灾而民无怨苦逃亡，现在是百姓疲于徭役而有愁恨。唐太宗面对这样尖刻的批评，不但没有动怒，反而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表示要将这份批评稿“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魏征在贞观之治的过程中，是以不断提出批评体现他的价值，这在中国封建专制条件下，实在是一个奇迹。因为中国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制，是以维护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古往今来，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能和魏征一样对一个具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不断提出严格要求的例证。魏征死了，唐太宗大哭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的这面镜子丢了。”这说明，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做帝王师的目标是可以争取的，但做“帝王镜”的目标，却是极难达到的。魏征死了，这面镜子确实再难找到了。

魏征的成功，取决于唐太宗的明智。没有唐太宗的支持，魏征可以成为帝王师，却不可能成为“帝王镜”。唐太宗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这是古往今来的封建皇帝很难说出来的话。

唐太宗之所以要这样做，在于他面临一个极需要开创的时代。他虽然在建立大唐王朝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但大唐帝国的开创者仍然是他的父亲李渊，他不可能把父亲的功绩据为己有。李渊曾经立唐太宗的哥哥李建成做太子，换句话说：如果唐太宗不发动政变，抢班夺权，天下本来是李建成的。他如果不做出一番

事业来，是无法向天下人说明自己比李建成强的，或者说他不能说明自己这个皇帝位子是坐得名正言顺的。

唐太宗为自己夺取政权提出了理由，这就是“有道者，人推而为主；无道者，人弃之不用。”他要做有道明君，不能不在父亲已经建立的政权的基础上，做出超过父亲的成就。

跟随李渊打天下的人，要唐太宗“耀兵振武，慑服四夷”；跟随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人，要唐太宗“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向唐太宗提出建议，自然使唐太宗不满意。

只有魏征看准了唐太宗胸怀大志，要完成一个“中国既安，四夷咸服”的伟大目标，于是提出了“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施政方针。

这个施政方针意味着要放弃骑在马上打天下的强硬作风，理性地对待实际问题。解决各种矛盾，让普通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从而拥护唐太宗的统治。唐太宗认为只有这个施政方针，才能保证自己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实现，于是把魏征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上。正因为除了魏征，没有人能够协助唐太宗完成这个政治目标，所以唐太宗要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说，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正是为了不影响政治目标的实现，唐太宗对魏征冲撞龙颜的一系列行动，不能不采取容忍态度。

只有了解了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唐太宗和魏征君臣关系的特殊性。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其实并非偶然。

只是这个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牵动了中国历代士人的情感，他们羡慕魏征的机遇，向往唐太宗的作风，于是，把唐太宗与